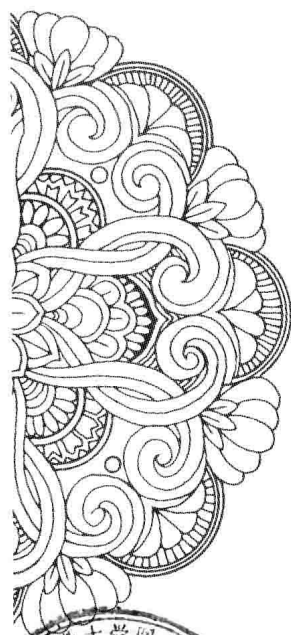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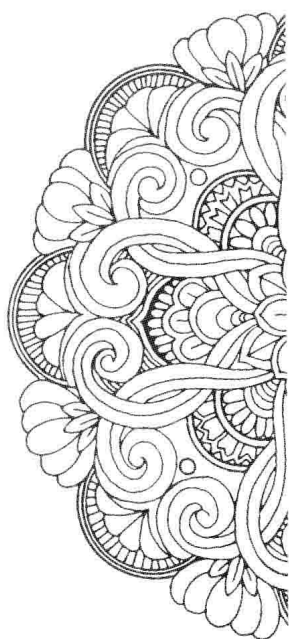


王运熙文集 2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从



上海古籍出版社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自序

本书初版本曾于 1981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这次是增补版。初版本原收文三十篇，一九九六年我出版《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时，把《论丛》中论述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四篇文章抽出，收入《述论》下编。它们是《略谈乐府诗的曲名本事与思想内容的关系》、《乐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关系》、《蔡琰与〈胡笳十八拍〉》、《吴声、西曲中的扬州》。现在作为增订版的上编，共收文二十六篇；下编共收文二十篇，则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二十年来陆续写成的。

我于 20 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大学毕业留任为复旦中文系教师后，开始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先是着重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并以该时期乐府诗中的通俗乐曲与歌辞为重点，于 20 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了《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两本小书，后来均收入《乐府诗述论》。20 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我的研究范围又扩展到唐代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史。20 世纪八十年代，曾把 20 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论文结集为三本论文集，除本书初版本外，尚有《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版）两书。从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与顾易生同志主编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该书分量庞大（共有三百馀万字），我参与撰写其中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两卷，执笔约四十多万字，十多年来的精力主要花在该书上面，因而其馀论文写得较少。这次增订本书，除去一部分篇章已收入 20

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拙著《乐府诗述论》、《望海楼笔记》(东方出版中心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安徽教育出版社版)三书之外,二十年来我有关该时期的论文,大体上都收入本书下编了。

我一直喜欢写单篇论文,不大喜欢写有系统的教材一类的著作,因为前者便于以较精炼的文字发表自己的见解,无须为了表述得全面系统,说许多人家以至自己已经说过的话。因此数十年来,除参与一部分集体编写的教材或教材一类的著作外,大抵均以单篇形式出现。学术界的有些同志曾经指出,一篇富有创见的高质量的论文,其价值要超过一部平庸的著作。我也深深同意这一看法,但自愧未能做到篇篇精粹。当然,我并不否认,也有一部分有系统的学术著作,富有创见,达到很高水平,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均是。再说,教材或教材一类著作,如能系统准确地传授知识,也是必要的、有价值的。有的教材还是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如上面提到的刘师培、王国维、鲁迅的书便是。因此准确地说,我们应当欢迎富有创见的学术作品,不管单篇论文也好,专著也好。就我个人来说,因为精力不好(特别眼力衰弱),缺少精力和能力从事大范围的综合研究,因而更喜欢写单篇论文,并不是笼统轻视系统性的学术专著。这是需要声明的。

我写作论文,一向注意尊重事实,从材料出发,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以期获得实事求是的论断。尽管如此,数十年来,特别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在社会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少数篇章也不免存在一些立论偏颇的毛病。今一仍其旧,不加改动。好在各篇下均注明发表年月或写作年月,读者结合年代当能理解。少数学术问题,由于个人认识的深化,看法有所修正与发展。如萧统的文学思想问题,本书中的《〈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一文,较之过去《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一文(收入拙著《中国古代文论管窥》),某些看法已有所修正。又如唐传奇文体与前代文学的继承关系问题,本书下编中《简论

唐传奇和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一文,对上编中《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一文,也有所补充和发展。读者鉴之。

本书上编中《寒山子诗歌的创作年代》、下编中《唐代诗歌与小说的关系》两篇文章,是杨明同志帮我寻找整理有关材料并执笔写成的,又得归青同志帮助校读样稿,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王运熙

2001年11月于上海寓所

目 录

自序	1
----------	---

上 编

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3
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局限及其历史原因	23
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风的关系	34
鍾嶸《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	39
范晔《后汉书》的序和论	47
孔稚圭的《北山移文》	61
陈子昂和他的作品	67
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	97
王维和他的诗	107
王昌龄的籍贯及其《失题》诗的问题	120
谈高適的《燕歌行》	124
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	129
李白诗歌简论	142
谈李白的《蜀道难》	157
略谈李白《蜀道难》的思想和艺术	162
谈二李的诗	169

读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	175
元结《篋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	183
寒山子诗歌的创作年代	193
白居易的《新乐府》	208
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	218
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	228
略谈韩愈的《师说》	241
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	248
《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	260
读《柳毅传》	268

下 编

汉魏六朝诗简论	277
汉魏六朝的四言体通俗韵文	292
读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	306
刘桢评传	311
谈前人对刘桢诗的评价	321
应当重视对《文选》的研究	336
《文选》简论	347
《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	365
《文选》所选论文的文学性	378
简论唐文文体	391
唐人的诗体分类	395
抒情诗的深层意蕴	
——谈唐人的几首登高诗	420
从“故园”说到王昌龄的籍贯	426

并庄屈以为心

——李白诗歌思想内容的一大特色	428
论李白的平交王侯思想	436
读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小记	451
讽谕诗与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	455
唐代诗歌与小说的关系	464
简论唐传奇和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	483
读《虬髯客传》札记	492
伟大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	500
谢庄作品简论	508
从《文选》所选碑传文看骈文的叙事方式	520
李白七言歌行的体式渊源	526
关于唐代骈文、古文的几个问题	534
初版后记	547

上 编

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建安原是东汉献帝的年号(公元 196—220 年)。文学史上所谓建安文学,时间范围稍广,指曹操、曹丕、曹叡(所谓曹魏三祖)当政的一段时期,即汉末魏初。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和党锢之祸,沉重地打击了提倡儒学的豪门世族。后来曹操尚法术,曹丕慕通达,都不重儒学。曹操、曹丕、曹植、曹叡等都爱好文学,不但自己大量创作,而且手下招集了许多文士,形成了一个邺下文人集团,经常互相以诗文酬答。这段时间内,儒学相对衰落,文学兴盛。文学较多地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呈现出新颖的面貌。《宋书·臧焘传论》说:“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这里雕虫是指诗赋,章句是指儒家经典的注释。这几句话概括地说明了曹操、曹丕当政后,儒学衰落、文学兴盛的局面。本文不拟对建安文学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而是从诗歌、辞赋、散文、小说等几个方面,着重论述其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新面貌。

建安诗歌的显著特色,是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与繁荣。

五言诗在汉代是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它最初产生于民间。现存时代较早的五言民间歌谣,有相传为秦时民谣的“生男慎莫举”篇、西汉成帝时的《尹赏歌》(“安所求子死”篇)和童谣“邪径败良田”篇

等。汉武帝时代,乐府官吏开始注意搜集各地歌谣,配乐演唱,以供帝王和贵族消遣娱乐;民间的五言新体诗以及少数乐工、文人模仿民歌体所作的五言诗,从此大量进入乐府。现存收民歌较多的汉乐府“相和歌辞”,其中以五言诗为最多,也最精彩。

“相和歌辞”,汉代属于“黄门鼓吹乐”,由黄门乐人或黄门倡优演唱^①。汉代的帝王和许多贵族,都很爱好这种出自民间的歌曲,因为它们新鲜活泼,悦耳动听。《汉书·礼乐志》载: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说明演唱这类乐曲的著名演员,很有钱势。但尽管如此,统治者毕竟把这类乐曲仅供消遣娱乐之用,其地位不高。《汉书·史丹传》记载,元帝爱好俗乐,器重善于演唱俗曲的人,史丹进谏曰:“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鞞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服虔注:“二人皆黄门鼓吹也。”)意思是说陈惠、李微虽是演唱俗曲的名手,但同熟悉儒学、善说《诗经》、位至宰相的匡衡是无法比拟的。同俗乐相配合的五言诗,在汉代的命运也是如此。一方面它们新鲜活泼,受到统治阶层的爱好;一方面又被正统派目为鄙俗,加以轻视。所以终汉之世,文人写作五言诗的不多。相传为李陵、苏武作的五言诗,还有《玉台新咏》著录的枚乘的五言古诗,根据后人的研究,都不可靠。直到东汉后期,写作五言诗的文人才稍微有几个;但他们写五言诗,也只是偶一为之,不像写辞赋那样作为一种专门事业。

这种轻视通俗乐曲和五言诗的传统观念,到了建安时代,在曹操、曹丕等的倡导下,有了彻底的转变。曹操、曹丕、曹叅都非常爱好通俗的“相和歌辞”。史称曹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繁钦发现都尉薛访车子善于歌唱俗

^① 参考拙作《说黄门鼓吹乐》,收入拙著《乐府诗论丛》(编者按:即《乐府诗述论》中编。)

曲,“潜气内转,哀音外激”(《与魏文帝笺》),马上写信报告曹丕,得到曹丕重视。《宋书·乐志三》说:“相和,本一部,魏明帝曹叡分为二,更递夜宿。”曹魏三祖不但酷爱通俗音乐,而且亲自制作了不少歌辞配合音乐演唱。《宋书·乐志三》所著录的相和三调歌辞,除“汉世街陌谣讴”的古辞外,大抵都是他们三人的作品,其中以五言诗为多。他们还倡导手下文人共同作诗(多数为五言)。如《初学记》卷十引魏文帝《叙诗》云:“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文选》诗“公宴”类中,曹植、王粲、刘桢各有《公宴》诗一首,应玚有《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一首,都是应曹丕之命而作的。“咏史”类中有王粲《咏史》一首、曹植《三良诗》一首,均咏三良为秦穆公殉葬事,当亦为同时互相唱和之作(阮瑀也有咏三良的《咏史诗》一首,《文选》未选录)。这样,围绕着曹氏父子,邺下文人纷纷写作五言诗,文人五言诗数量大增,臻于繁荣。《文心雕龙·明诗》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诗品序》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都论述了建安时代文人五言诗蓬勃发展的情景。从此,五言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重要样式,在诗坛占据了主要地位,而且在以后一千多年中一直影响深远,源远流长。这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汉乐府民歌中的一部分篇什,长于叙事,生动地描绘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建安文人诗歌继承了这个优秀传统,一部分作品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像曹操的《薤露》、《蒿里》,曹植的《送应氏》(“步登北邙阪”篇)、《泰山梁甫行》,王粲的《七哀诗》(“西京乱无象”篇),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都是其例。长诗《焦仲卿妻》(无名氏作)和《悲愤诗》(蔡琰作)也产生在建安时期,由于篇幅加长,人物性格和心

理刻画更为细腻,情节更为曲折,标志着汉乐府民歌中的优秀叙事诗,到这时由于文人的努力学习和提高,有了新的发展。上述这些叙事篇章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像汉乐府民歌那样,比较纯粹地叙事,描写比较具体生动,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无名氏的《焦仲卿妻》属于这一类。其他篇章属于另一种情况,其特点是:虽以叙事为主,但结合着抒情;叙事比较简括,抒情气氛较浓。王粲、曹植过去常常被视为建安诗人的代表。王粲的《七哀诗》三首、《从军诗》五首,曹植的《箜篌引》、《野田黄雀行》、《七哀诗》等,都是叙事结合着抒情。曹植的《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也是叙事诗,但骈句络绎,辞藻缤纷,与汉乐府民歌以朴素语言、白描手法叙事者,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我们今天看来,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以及风格逼近汉乐府民歌的文人之作(像陈琳、阮瑀的作品),不但思想内容好,艺术上也非常生动突出。但在建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别是南朝时代),创作风气重视语言华美,轻视朴素的白描,所以对这类诗估价不高。对这类诗,《文选》一首也不选,《文心雕龙》、《诗品》或者评价不高,或者根本置而不论。他们重视的是王粲、曹植那种叙事不尚白描、语言华美或较为华美的篇章。

比较起来,建安诗歌中,数量更多,代表性更大的还是抒情诗。这类诗,以《文选》所选录的来说,像“公宴”类中曹植的《公宴诗》,应玚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咏史”类中王粲的《咏史》,“游览”类中曹丕的《芙蓉池作》,“赠答”类中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赠徐幹》、《赠从弟》(三首),曹植的《赠徐幹》、《赠丁仪》、《赠王粲》、《赠白马王彪》,“乐府”类中曹操的《短歌行》、《苦寒行》,曹丕的《燕歌行》,“杂诗”类中曹丕的《杂诗》(二首),曹植的《杂诗》(六首)、《情诗》等等,都写得较好。《文心雕龙·明诗》评建安诗有云:“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指的正是“公宴”、“游览”、“赠答”、“杂诗”各类上述这些诗篇的重要内容,它们反映了

当时曹氏兄弟和建安七子(孔融除外)等文人聚会在一起互相酬赠的风气,也反映了他们经历社会动乱,希冀乘时建功立业的慷慨情怀。此外,《文选》未选的抒情诗佳作,像孔融的《杂诗》,曹操的《步出夏门行》,曹植的《吁嗟篇》、《蝦蟆篇》,徐幹的《室思》等等,还可以举出一些。上述诗篇,除少数篇章(曹操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燕歌行》)外,都是五言诗。建安诗人中,曹操、曹植、王粲、刘桢诸人的成就最高。他们都长于抒情。特别是曹植,不但作品数量最多,而且表现思想感情细致深入,诗人的个性最为鲜明突出,语言也最为富美,他不愧为建安诗人中的大家。

建安作家的乐府诗,固然直接学习乐府民歌;其他五言诗,亦深受乐府民歌影响,具有清新刚健的特色。黄侃《诗品讲疏》评建安诗歌说:“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间里歌谣之质。故其称景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英响。”(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中肯地指出了建安诗歌虽有“文采缤纷”的“雅词”,但不讲求雕镂,还保持着乐府民歌质朴的特色。曹植诗在建安作家中语言最华美,骈偶句也最多,但仍然具有这种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清新刚健的特色,后来被称为建安风骨。对于风骨一词的涵义,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按《文心雕龙·风骨》说:“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又说:“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风骨是指作品的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语言遒劲有力,是指作品具有明朗刚健的风格。《文心雕龙·明诗》评建安诗歌说:“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指出了建安诗歌具有明朗刚健的特色。昭晰的反面是纤密,作品辞藻富丽纤密,容易损伤明朗刚健的风格;建安诗歌“不求纤密之巧”,所以风骨突出。有的同志认为风骨涵义首先是指作品思想内容的充实健康,这种看法不对。我另有专文详论,这里不赘。

建安诗歌一方面保持民歌清新刚健的特色,一方面又缘以雅词,颇有文采,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诗品》赞美曹植诗“体被文质”,就

是说其作品文质结合得好。从西晋太康年间开始,特别到了南朝,许多文人作品竭力追求文辞富艳,丽藻满篇,结果思想感情表现得晦昧不明朗,语言柔靡不振,缺乏风骨。因此刘勰、鍾嵘针对当时不良文风,提倡风骨。到盛唐时代,诗人们为了改革南朝的淫靡诗风,更大力提倡建安风骨。

二

建安时代,辞赋受到重视,地位比过去大为提高;在创作上,则表现为抒情状物小赋的发展。

汉代辞赋很发达,作者众多,但当时不少人士对辞赋的地位和作用估价一直不高。汉代帝王往往豢养一批赋家,以倡优畜之,视为弄臣。西汉的扬雄,晚年对辞赋很轻视,自悔过去写了许多辞赋,把辞赋斥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见《法言·吾子》)。同时他很重视学术著作,晚年专心撰述,模拟《论语》作《法言》,模拟《周易》作《太玄》,以求立言不朽。东汉的大思想家王充非常重视学术著作,认为它是鸿儒的事业(见《论衡·超奇》);而对辞赋则颇轻视,曾批评赋颂“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他们都重视学术,轻视辞赋,认为辞赋是文丽用寡之物。这种见解在汉代是有代表性的。

这种轻视辞赋的观念到建安时代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鲜明地反映在曹丕的文章中。他的《典论·论文》评论建安七子,首先赞美王粲、徐幹两人的辞赋,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后面又强调指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个人的年寿有限,而文章却可传之无穷。他的所谓文章,包括辞赋、奏议、书论、铭诔等单篇文章和徐幹《中论》一类学